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九〇期 ——
(二〇一三年四月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04b)

【文革一页】	砸烂公检法和清理阶级队伍	杨宪澄
【文革往事】	在一首“反动诗”的背后发布—— 从有关《悼》诗的一句“交代”说起	何 蜀
【一家之言】	听鲍彤谈林彪	高 瑜
【不堪回首】	元宝山牧场的“挖肃”灾难	原志久·刘凤歧
【文革一页】	曾经知名的“洪广思”	韩三洲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文革一页】

砸烂公检法和清理阶级队伍

• 杨宪澄 •

—

文革前公检法毛主席称之为“刀把子”，曾几何时，砸烂所谓反动公检法成了毛主席在文革中的重要棋子，后果极为严重。然而在文革结束后，鲜有揭露它的起因和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不是穿靴戴帽一笔带过，就是遮遮掩掩语焉不详。

砸烂公检法的罪魁祸首表面上是原公安部长谢富治，但他不是头脑简单的政治打手。前半生是战功显赫的上将和在云南治理禁毒和治安颇有政绩的省委书记。他对某些敏感问题能够深入调查敢于坦露，1965年他在浙江乔司劳改农场蹲点时曾在省公安厅作过报告，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他讲到云南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打击对象面的调查统计——以被打击的一家三口计算，打击面超过云南省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并说“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应该说在当时的上层领导中是非常清醒的认识，问题是同样是这个谢富治为什么会在文革中嬗变成

唐朝著名酷吏来俊臣式人物？只能说他心目中把对领袖的忠诚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封建的臣民思想在作祟。什么“原则和道义”统统束之高阁。

据陪谢富治在浙江乔司农场蹲点调查的省公安厅徐××透露：1965年谢在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在乔司农场蹲点情况，毛要他回去好好读《水浒传》第一回。他回来当夜要徐帮他找《水浒传》并连夜阅读研究，以他作为公安部长的嗅觉和悟性，他领悟毛主席要发动政治运动，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像《水浒传》第一回中描述洪太尉打开伏魔殿放出天罡地煞一大批牛鬼蛇神造成天下大乱，来清除被毛主席认为是政敌的人以达到所谓天下大治的目的。它反映了毛主席当时的心态，文革发展也证明毛主席为了达到打击被他认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人员，他是不择手段，亦不计后果。

1968年4月砸烂所谓反动公检法是从北京市公安局开始的，在谢富治的教唆下，北京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刘传新（某军副政委）炮制了《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报告称“北京市公安局10个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以及分局、县公安局长全都是特务叛徒和三反分子”。“全局有一千多坏人”。并诬陷“公安侦察部门通敌、资敌”，“侦控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等骇人听闻的莫须有罪名，只要稍有正常思维能力的都会难以置信的，毛主席当然知道，但他需要这样骇人听闻的材料作为政治上的突破口，所以他毫不迟疑地在此件上批示“请各地军管部门注意此类情况”。这样由国发第142号文件下达，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砸烂公检法的高潮。现在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通过这个充满谎言的文件来砸烂公检法，来达到打倒刘少奇、彭真的政治目的。真是像封建王朝那样“欲加以罪，何患无辞”。

此后，谢富治公开说：“毛主席在我面前讲到要砸烂公检法没有十次至少也有七八次……”。此话可信，它真正道出了毛主席把砸烂公检法当作文革中一着重要的棋子。所以全国公检法被军管，并由公安部长谢富治带头砸烂公安机关就不奇怪。于是各地公安机关军管会纷纷向北京公安机关军管会看齐，学习刘传新罗织罪名经验，一时间像大跃进年代放卫星那样，什么某地“公安机关是坏人当道，特务专政”，某地“名为侦察工作，实为通敌渠道”等等纷纷出笼。

据不完整统计：全国公安机关干部遭受打击迫害的达34万之多，被逼死打死的1200余人（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死在秦城监狱），被致伤残的3600余人。

浙江公安机关是被砸烂中的重灾区，省公安厅三位正副厅长和警卫处长侦察处长以及一名女侦察干部共六人被押送北京关押审查。省公安机关军管会主任朱全林学着北京市公安机关刘传新的腔调说：“浙江旧公检法十七年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在全国砸烂中发生的恶性事件里，浙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乐清县公安局预审干部被枪杀在预审室里。台州公安干部对被莫须有罪名判刑不服，在劳改农场遭枪杀。杭州市公安局侦察干部汤良被诬外国特务罪名愤然自杀，妻子生活无着流落在街头讨饭而无人过问。在省公安厅院子里，有被批斗后遭殴打而上吊自杀的，有用铁钉砸进脑袋里自杀的。全厅批斗会上，吆喝着：“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带上台来！”结果满台挤不下，职务较低的只能站在台下前排接受批斗。

其实浙江省公安机关在对美蒋特务斗争成绩是十分显著，浙江的海外情报工作是公安部的重点单位，1955年浙江是最早获悉美蒋特务在香港实施爆炸“克什米尔”号客机的罪恶计划的单位之一，使周总理参加万隆会议躲过一劫。对美蒋特务潜来我省的也基本做到了如指掌，1956年12月台湾专员级特务张毅潜来杭州，杭州、嘉兴被张毅认为是两个可靠的落脚点，结果这两个可靠的落脚点的群众都主动报案，并配合我们工作，迫使张感到走投无路，最后向我投案自首（张被安排在杭某院校后评为教授）。同年有一起代号为“1141”的案件获取美蒋特务制订的“××计划”，时毛主席在杭，副厅长丛鹭丹要我立即抄成小山核桃大的字体上报，

毛主席在抄件上签上“阅”字后退回归档。为了配合两岸和谈，通过海外关系将奉化蒋氏墓道修葺后的照片转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看后笑着对宋美龄说：“奉化修墓，浙江江华是无权决定的，看来是北京毛泽东决定的。”上述情况也是及时上报公安部并转报毛主席的。然而浙江公安机关军管会为了学习北京市公安机关军管会罗织莫须有罪名经验，不顾党和国家利益，唆使原派遣处干部包某等人，把上述相关的案件端上大批判栏，作为公安机关，“通敌罪证”，甚至把与海外通讯的转信地址也编印成册发至有关单位追查所谓敌特分子，其后果是无法估计的。当年我们打入台湾“国防部”二厅驻香港一机构，因工作失误被港英警察机关发现而遭到逮捕，港英当局拟以台湾特务准备遣返金门，我们的人员才宣布：“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间谍人员。”他们被遣返后公安机关军管会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一批海外密干和情报人员一律以通敌罪名统统送金华劳改农场劳改，甚至还把留在海外工作的也诱骗回来一并送往劳改。当时这些隐蔽战线的战士的行李堆满在公安厅大门的门厅里，我们见状欲哭无泪。

公安机关被砸足足三个年头，1970年12月至1971年2月召开全国第十五次公安会议，这次历史性的长会，既没总结砸烂公检法的所谓“伟大成果”（实际反证了北京市公安机关军管会炮制的《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诬陷），也没提砸烂中的消极教训，而是组织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论述。讨论毛主席的指示：“对公安机关要一分为二，也（还）有好的么。”这是砸烂公检法的结论。说得明白点，一分为二中少数是好的，多数是坏的。尽管在会议后期，周总理讲话中端出了解放以来公安工作的实情。周说：“解放后十七年，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领导下的，不能说是黑线统治”，“条条战线毛主席亲自管的最多的一是外交，二是公安”，“好多次公安会议文件，都是毛主席亲自修改和审批的，有的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一共开过十四次（公安）会议，毛主席亲自过问的就有十次。而且还有很多具体批示……”。“就整个公安队伍看还是好的，怎么能说整个系统垮掉要重建？……”显然周总理为公安工作讲好话，希望扭转这种黑白不分的局面。然而毛主席并不认可周总理的讲话（也为后来批林批孔批周公埋下伏笔），因为他看不到全国乱局的尽头，更看不到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的曙光，所以他批准的《会议纪要》仍要继续对建国十七年来的公安工作错误路线进行批判，认定“刘少奇、彭真、罗瑞卿的黑线远未肃清……”。会后公检法还得继续砸下去，大批公检法人员被组织下放改行，提倡“掺沙子”把军队转业复员人员安排到公安部门，留用的以“旧公检法人员”对待。

二

1971年“九一三”副统帅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怎么从残局中走出来成了毛主席首先思考的问题，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然而年近八十，心神交瘁，在他身上出现明显思维混乱迹象。1972年12月铁道部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刘淑清（外交部干部）因丈夫被关在秦城监狱久押不决，通过王海容转信向毛主席诉说监狱里每天只有两杯开水和30分钟放风等等，目的是希望早日解脱出来。毛却在信上批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似乎对刘建章这么一大批副部级以上干部关押在秦城监狱审查，是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他是一概不知，所以要一律废除。难道他忘了是他自己提出要清理阶级队伍的最高指示，1967年12月6日“两报一刊”还发表社论？中央文革直接领导的中央专案组一、二、三办（后加上清查516办公室）的成立，此前秦城监狱日夜施工的扩容工程难道是别人背着毛主席干的？其实“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的批示是推卸责任，给自己下个台阶，根本不是真的要把关押审查的干部统统放出来。只是从1973年开始陆续地释放一些，如上述的刘建章，又如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中共五大唯一的女中央委员，毛主席当时是中共候补委员）病危临死前三天才被宣布解除审查，通知家属准备后事。

据中央组织部资料，文革前全国党政干部1200多万，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无辜审查的230多万人，占总人数的19.2%，中央、省、市、县领导干部占75%，中央各大区书记

囚居在京西宾馆，部级一律送秦城监狱（秦城监狱容纳不下又临时把政法干校、交通干校作为临时审查室，设施简陋，据浙江省公安厅邹景玉、陈明两同志反映，他被关押时每天两餐，每餐一只窝窝头加盐菜用手捧着吃），中央直接专案审查近600多个案件，每案涉及人数不一，少者一人，多者数十人不等（浙江省建设厅一位姓秦的高级工程师莫名其妙地被中央专案组二办一个电话通知给抓了起来，理由是“涉及某个案件”，寄押在公安厅看守所后四年无人过问）。省、地、市、县的被审查对象也分级关押在招待所、庙寺、看守所等处。至于毛主席以党中央名义发出“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在工厂、学校、农村”的号召之后，清理阶级队伍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被审查的无法统计（一说为3000多万，多为《公安六条》中的21种对象），于是群众专政名义的组织纷纷登场，土牢遍设，刑讯逼供无所不用其极。湖州发生对被审查的人用火烧阴毛，东阳县用公猴逼供女被审查人员，永康县审查中用毒蛇威胁，绍兴一酒厂领导在审查中被饿饭两天，夜间去食堂偷饭时遭到看管人员阻止而发生斗殴，忍无可忍下将看管人员打死，结果以阶级报复罪判处死刑。如果说关在秦城监狱每天两杯开水和30分钟放风是“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那么数以千万计的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受到群众专政的人身摧残（个别地方出现民办枪毙，集体棒杀的惨案），是汉语中找不到准确的词语表达的，只能说是“人间地狱”。这种惨无人道的清理阶级队伍又是谁规定的？

那个年代，“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最高指示一句顶万句，谁敢不学习，谁敢不执行？全国监所无不组织学习一番，结果没有一所监所执行，不是不执行，是没法执行。1973年我陪同北京秦城监狱副监狱长等人以中央专案组名义去江山执行任务时谈起此事，他讲：“我们是同行可以讲讲，两杯开水，30分钟放风已是最大的努力。问题是监狱里关押太多，关押时间太久，又是高干（副部长以上），他们情绪一激动就找我们发泄：你们还要把我关多久？我过去身体很好，现在血压高……等等，我们只能解释：你的案件是专案组办的，我们只能替你反映，你身体不好我们可以陪你去医治，其实我们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我曾问他秦城监狱在押人员中患监狱综合征的多不多，他不敢多谈此类问题，只是透露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双眼失明，原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精神失常等等。其实，一天两杯开水30分钟放风是人道主义的监所生活，而任意罗织罪状，单独关押又久押不决（起码已关四五年）是极容易患监狱综合症，精神失常，那才是真正的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更不必说在审查中刑讯逼供（如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在秦城监狱遭到24小时轮番审讯和反背铐等酷刑。中专二办在制造所谓浙南叛徒集团冤案时，在丽水县公安局竟用扁担将被调查人季彬肋骨打断。浙江原警卫处长邹景玉、侦察处长陈明在公安战线上是有功之臣，然而在北京被审查时都遭到刑讯逼供，邹至今留下头部被殴打的后遗症。与邹一起被押送北京的女侦察员李梅被逼供致精神失常……）。

“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应一律废除”，还得问一问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专案组，他们立案的根据是什么？单凭一张名单或某领导的一句话行不行？捕风捉影的材料经过调查结果怎么样？查不下去又该怎么办？专案组成员有的是坚定的“阶级立场”，可缺的是起码的办案程序常识。砸烂公安部之后居然出了赵登程（空军第八军副军职）这样的人当上副部长，他不敢正视土牢遍设，冤案堆山的局面，公然提倡1300年前《大唐六典》的所谓众证定罪办案，即“一人供听，两个人供信，三个人供定（案）”。案件以口供定罪，这是司法制度的大倒退。在那个年代无人敢抵制，于是刑讯逼供，株连无辜成风。

在“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批示一年多后，只有27岁的毛远新被任命为沈阳军区政委，主政辽宁省。1974年4月4日他对省委宣传部干部张志新因在学习会上批评毛主席从反右以来的错误，竟以“恶攻罪”将她判处死刑，并下令在执行死刑前先将她的喉管切断。1979年我参加全国预审工作会议期间找沈阳市公安局预审处李某询问此案，他还透露，类似案件有六件之多。这可算是对“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最辛辣的讽刺。真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毛主席真正把“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摆到议事日程上是在1975春季，这是因为1974年12月他提交全国人大特赦全部国民党战犯，引发下面各方面的强烈不满，特别多的是“干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还关着，释放的还没有结论，战犯倒全部释放，安排工作”。毛主席指定华国锋等人负责清理审查工作。据说1975年3月毛主席在杭州亲自对准备释放的300多名高级干部材料逐个过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等一批人除外）。毛又担心这些属中央管的高级干部释放后内心不会臣服，规定除个别外一律遣送回原籍安置。

所以说“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的批示实在过于做作，是极不高明的遁词。

公安部长谢富治人生最后岁月，因颁发《公安六条》以言治罪的恶法和砸烂公检法有功，被钦点荣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死后却被开除出党，骨灰清出八宝山公墓；北京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刘传新自知罪孽深重，在粉碎“四人帮”后畏罪自杀；毛远新则获刑17年。毛主席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诏狱多滥，自古而然”。从上世纪50年代处理潘汉年、扬帆开始，不断地重演悲剧，越演越烈，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中砸烂公检法和清理阶级队伍，造成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历史大悲剧。中国共产党应该严肃地面对历史大悲剧，哀而鉴之，上下互动，加快政治体制改革，防止权力被滥用。否则真是呜呼哀哉。

□ 《炎黄春秋》 2013年第2期

~~~~~

#### 【文革往事】

在一首“反动诗”的背后——  
从有关《悼》诗的一句“交代”说起

• 何 蜀 •

读李亚东的《查勘地下文学现场——从1960年代蔡楚的“反动诗”说起》，意外读到他从历史档案中抄出的一句提到我名字的话，那是蔡楚在1970年就其一首“反动诗”《悼》所写的交代中的话：

当何蜀看到我这首诗批评我沿用了五四时期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晦涩的艺术形式时，我还不服气，认为自己是旧瓶装新酒，没有错。

我惊异于自己的记忆，竟会在岁月逝水的反复冲刷下对此事毫无印象了。不过，我得承认，当时我的思想认识确实就是如此，正处于一个十分狂热、激进、偏激的状态，对所谓“资产阶级文艺”一概嗤之以鼻，认为现在是“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了，必须重头开始，另起炉灶，开创一片全新的天地——真正是“无知者无畏”，实际上自己对所谓“资产阶级文艺”的接触和了解极为有限，比如蔡楚早已在文革前就精读熟吟的戴望舒、闻一多、汪静之的那些诗，除了一两首或个别句子外，我都基本上没有读过。只读过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等很少几首，从内心讲是很喜欢而且过目难忘的，但在意识上却总是告诫自己那不是正道，只有郭小川、贺敬之以及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才是“无产阶级诗歌”的正宗，才是效法的样板。

李亚东兄查勘地下文学历史现场的努力令人钦佩。不过他还只看到了这些“反动诗”及其相关交代材料，不了解在这些诗及交代材料的文本背后还有什么。我愿再提供一点有关《悼》诗及其交代的背景情况。

蔡楚本名蔡天一，他的那首“反动诗”《悼》，是为无辜死于文革武斗的孙从轩写的。

我和他们相识在文化大革命中。

那时我们都在参加“四川石油大会战”，是四川石油管理局机械化筑路处的工人——不是真正的“石油工人”（虽然我们经常要唱那首“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的流行歌曲），只是为真正的石油工人做好钻井前的“钻前工程”——修公路、平井场的临时工。

这场大会战，我们是从文革前夕的1965年开始参加的。我们那个名字很好听的“机械化筑路处”，实际上除了很少一点推土机、空气压缩机和较多的运输车辆外，劳动工具仍然主要是锄头、扁担、箩筐、钢钎……仍然是以五六十年代常见的那种手挖肩抬的“人海战术”进行施工。全筑路处有七八个工程大队，大多是从重庆、成都、荣县、威远、资阳、乐至、蓬溪等大中城市里招收的临时工。重庆人最多。几个大队都是以重庆人为主，基本上是按一个街道办事处编为一个中队。成都人在文革开始时只剩下了一个中队（一百来人），即蔡天一交代中落款所写的“土建中队”，我们那时都称他们“成都中队”。

我认识他们的时候已经是文革群众造反高潮中的1966年底、1967年初了，在位于荣县东兴场旁边一座小山岗上新落成的筑路处机关所在地红旗村——当时整个石油会战的指挥中心（会战领导小组和会战指挥部、会战政治部）设在威远新场附近一处山坡上兴建的红村，据说其他各处按计划要建红一村、红二村、红三村……是否都建起来了，我们不知道，只知道筑路处被排为红七村，文革中为了名称上的革命化，也被写作红旗村。

我和蔡天一、孙从轩，用当年的话说是“造反战友”——都参加了那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造反运动。其实我们都属于“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当时也叫“狗崽子”），我的父亲是“右派”，蔡天一的父亲是“反动军官”，孙从轩的父亲是“小业主”（他父母曾开有一家小中药铺），成都中队的另一个朋友张征祥的父亲是“资本家”，本来都不应参加文革造反，为什么我们也成了造反派甚至还当了头头或骨干呢？这就涉及到我们那个临时工队伍的整体状况。

当石油会战指挥部开始在四川各地招工的时候，已经是全国开展“四清”运动之后了，这时在社会上还没有正式工作、能够应招去参加石油会战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自60年代初期毛泽东把“阶级斗争”当作一切工作的“纲”加以强调以来，无论是升学还是就业，首先都要查“家庭出身”和本人“政治面貌”，大量“家庭出身不好”的初、高中毕业生（其中相当部分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因此成为失学、无业的“社会青年”（有的已经被迫上山下乡去当了知青），“社会青年”中还有个别高中或大学没有毕业就因“出身不好”而被强令“自动退学”的学生（不退学就要开除）。当听说石油大会战招工而且无需“政审”来者不拒的时候，这些人当然就欢欣鼓舞踊跃报名参加。因此在我们那个队伍里，年轻人基本上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初中、高中毕业生（还有少数未成年的小学生和个别被强令退学的大学生），成年人则大多是本人有“问题”的，有的是劳改、劳教刑满释放人员（当时被称为“刑满释放犯”，头上仍然有一个“犯”字），有的是家中有被“杀、关、管”（被镇压、被判刑关押、被戴上“帽子”管制）的亲属而难以找到正式工作的人员，有的是被原工作单位开除或精简压缩的人员（多半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之，不是家庭就是本人总会有什么“污点”。在某些人的眼里，都是所谓的“社会渣滓”。也因此，我们临时工队伍里几乎没有一个中共党员（每个工程大队都只有几个领导干部和炮工班的几个师傅是党员）。

由于这样的人员构成，文革发展到群众组织遍地开花的全民造反阶段时，我们那里不光造反派组织，甚至连保守派组织都几乎找不到几个人是“根红苗正”的。“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

锋”，我们就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被推到了第一线。

此外，我们都是长期受那种“革命教育”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当时有一句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恐惧不是苦，也不是死，而是被排除于“革命”之外（这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很难体会到的），在长期受到政治上的歧视、压制甚至打击之后，突然之间，一场由“伟大领袖”发动的、席卷全国的群众造反狂潮把原有社会秩序完全打乱了，颠倒过来了，似乎让我们有了合法的机会“参加革命”了，甚至可以表现得比那些过去歧视压制打击我们的人更“革命”了，而那些过去一直以“革命”自居的当权派和政治运动积极分子们一下子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人，犯下了“反对毛主席”的滔天大罪，威风扫地，狼狈不堪……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这样的人有了一种得到“解放”的扬眉吐气之感。这样，我们就兴高采烈地戴上红袖章，投入到了这场“比赛革命的革命”（胡平语）当中。

在1966年底、1967年初我和蔡天一他们相识的时候，我还不到19岁，蔡天一年长我3岁，孙从轩年纪还大一点（1941年生）。我因在此前被打成“反革命”监督劳动两个多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由筑路处党委正式平反，这时自然成了造反派，被推举到几个大队的造反派组织在红旗村联合组建的造反司令部当“勤务员”（如前所述，我们那个司令部的“勤务员”里没有一个是“根红苗正”的），我主要负责写文章、刷标语、刻印传单、上广播宣读各种稿件（广播是处机关设在红旗村的有线广播，各个群众组织都可以去排着队自由宣读自己的东西，最混乱的时候甚至有职工到广播上喊他的家属快把钥匙拿回来开门）。当时成都中队驻红旗村坡下，我听说他们中队的几个“眼镜”文化高，很有头脑，这几个“眼镜”就包括蔡天一、孙从轩，还有张征祥。当时一般都称他们蔡眼镜、孙眼镜、张眼镜。

看得出来，孙从轩在成都中队是有威望，有号召力的，他个子不高，皮肤白晰，眼镜后一对小眼睛，上唇留着一抹小胡子，经常见他在破棉袄腰间拴根稻草绳，头上一顶皱巴巴的帽子也很少戴端正，总之做出一副落拓不羁的样子。后来知道，他父亲早逝，同父异母的哥哥是成都晚报社的“右派”，他本人因“家庭出身”问题于60年代初期被甘肃省农业大学勒令退学。在筑路工地上，这样的大学肄业生自然要算凤毛麟角的“高知”了。我们临时工当中像我这样的初中生最多。因毛泽东主张的愚民政策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官方信得过的依靠对象往往是文化不高的老工人、转业军人之类。对这种“依靠对象”的文化素质，成都中队就曾有过一个笑话：“十六条”刚公布过后，官方组建的“毛泽东主义工人赤卫队”（主要是政工、保卫干部及一些老工人）派人下来“宣讲十六条”，到成都中队宣讲的那位“依靠对象”，讲到“十六条”上规定的各单位文革委员会、文革代表大会要像巴黎公社那样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时，自作聪明地讲解说：你们晓得巴黎公社在哪里吗？那是北京郊区的一个人民公社，民主选举搞得最好，所以中央把它作为样板……听得成都中队那些略有点文化知识的“非依靠对象”们都忍俊不禁但又强忍着不敢笑出来。孙从轩当时与身边的蔡天一议论了几句并笑出声来，就被当场揪出来批斗——这是他后来带头造反的直接原因。

后人可能难于置信，我们当时的造反，完全是按照中央的号召在亦步亦趋地进行，真的是“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从来不去考虑为个人谋取什么利益，甚至没有想到要借机把自己最切身的利益——临时工身份改变一下。当时只有成都中队的老夏是这方面的明白人，他不知何时联系上了那个专门为临时工谋利益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即后来被中央明令取缔、被首都三司等造反派围攻、砸烂的“全红总”），参加进去后还当了个什么分团的头目，但他基本上只是个“光杆司令”，没有几个人跟他跑。我们这些自认为“正统”的造反者都看不起他，认为他是在搞“经济主义”，背离了“斗争大方向”。

1967年初，毛泽东在号召向走资派全面夺权的同时，又通过他亲自批准发布的“公安六条”、“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他亲自修改审定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

派的夺权斗争》，在全国大张旗鼓发动了一场打击社会上“牛鬼蛇神”的“镇反”运动。3月初，“镇反”之风刮到石油会战工地，孙从轩、张征祥以及那位老夏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进荣县监狱。从公布出来的“罪状”中人们惊骇地看到，孙从轩参加过“反动组织天主教圣母救国军”！——人们后来才知道真相：他的母亲是天主教徒，母亲在他两岁时即让他接受了洗礼，从他母亲的角度看，他是皈依了天主教。不过，孙从轩从8岁开始即“长在红旗下”，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接受的完全是共产党的党化教育，当时根本就没有可能参加宗教活动，因此他显然说不上有什么天主教的宗教信仰。在成都中队没有人知道他与天主教的这一层关系，只有掌握人事档案的官方才知道。那个年代，凡信教都会被视为“反动”，信洋教简直就等于“帝国主义特务”，这种身份还参加和主持造反，这当然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了。

“天意从来高难问”。孙从轩他们在狱中刚待了一个月，1967年4月初，善于变脸的毛泽东又把明明是自己部署搞起来的“镇反”说成是下面的支左部队和专政机关搞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并与所谓“二月逆流”挂在一起进行批判（其实许多地区的“镇反”都是在“二月逆流”已经被否定、批判之后才开始的），强令转向，各地赶紧给“现行反革命”们平反，监狱陆续放人。孙从轩他们出狱的时候，我们正被解雇回家——石油会战因为文革的冲击已经难以继续，加上各级领导不愿再看到这些重新平反的造反者们找他们的麻烦，就干脆解雇了事。我们回家后不久，四川各地就在“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下从动乱走向新的更大的动乱，陷入大规模武斗之中。招工无望，我们一些人又返回红旗村“造反”。成都中队的一些人还通过蔡天一的努力，办成了复工手续，重新领到了工资。

不过，孙从轩返回筑路处复工后，没有再像“镇反”前那样积极参加造反活动了，或许他已经看透了这场所谓“大民主”愚弄民众的真相，或许他知道自己那个“天主教徒”的身份不宜再参与造反活动，再加上他家庭的困难：他同父异母的哥哥被打成“右派”后失去公职，靠在成都走街串巷补铝锅为生，他亲姐姐据说在重庆大学读书期间下乡参加“四清”时溺亡。家中年迈的老母亲卧床不起，需要供养。他趁到处“全面内战”、停工停产之机，悄悄跑回成都，一边打“黑工”——蹬平板三轮车送人送货挣点脚力钱养家，一边照顾老母。

不幸的是，1968年4月21日，他蹬平板三轮车从成都无线电机学校门口经过时，被该校的“红成”派“野鸭子”（当时成都人对那些不是为派别利益作战而是在社会上胡作非为的武装团伙的称呼）人员拦住，要他帮忙拉伤员去医院（伤员是“野鸭子”与“红成”派的川医“九一五”武斗人员争饭吃打伤的），在枪口下，他不得不照办。当他被押着蹬平板三轮车从四川医学院门前经过时，占据该校的“九一五”武斗人员又跟“野鸭子”展开枪战，他无辜中弹身亡。终年27岁（生日刚过三天）。尚未成家。

那时我和张征祥都在成都（我以无业者的身份在那里为朋友们义务当“笔杆子”），噩耗是蔡天一来报告的。他通过成都警司到殡仪馆的无名死者中查到了孙从轩的遗体，亲自送去火化。当时我们那个组织已经归到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旗下，成为该兵团下属的石油系统分团。于是就以石油系统分团的名义为孙从轩发了讣告，举办了追悼会，还从四川大学拉了一车花圈（川大当时经常召开“烈士追悼会”，堆着不少花圈）来布置会场。讣告是成都中队的沙世谦起草的，其文字很有时代特色，特录此以供了解——

最高指示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讣 告

高天哀鸣，大地悲伤！

正当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的灿烂曙光升起在地平线上的时候，我们向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向全川石油战线上的《红十条》派的战友们沉痛地宣告，我兵团石油系统分



团优秀战士孙从轩同志，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捍卫《红十条》，于4月21日中午被地总红成川医九·一五中一小撮反坏分子所枪杀。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我兵团战士闻此噩耗无不义愤填膺，挥泪如雨，旧仇新恨，交织于胸。血债要用血来还！

粉碎右倾翻案逆流！

还我战友，还我血！

孙从轩烈士出身于小商家庭，现年27岁，65年参加石油建设工作。孙从轩烈士无限热爱毛主席，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工作一贯踏实认真，曾被评为优秀的生产突击手。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高举革命造反有理的大旗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殊死的斗争。被走资派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在二月黑风中被打成“反革命”，投入荣县监狱近一月之久，在狱一直坚持斗争，出狱后更积极地参加捍卫《红十条》的斗争。不幸于68年4月21日中午路经四川医学院门口时被地总红成川医“九·一五”中一小撮阶级敌人开枪射击，罪恶的子弹穿入了他的胸部、大腿等处。孙从轩烈士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实现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壮丽誓言。

“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

孙从轩烈士未完成的事业，我们来完成吧！我兵团战士誓死捍卫《红十条》，誓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死难烈士万岁！”

讣告中用了许多当时的“主旋律”语言，称孙从轩“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云云，显系虚美不实之词，我当时对此是颇不以为然的。后来我才知道，成都中队朋友们的苦心，不过是为了以此高调给孙从轩在筑路处争取解决抚恤问题，为他孤苦的老母多争得一点补偿。

孙从轩的死讯没人敢去告诉他母亲，最后只好由他哥哥向他母亲谎称孙从轩被送去劳改了。孤苦的老母亲就在不断呼唤儿子的呻吟中辗转病榻，拖了年余，撒手归天

蔡天一的那首诗《悼——写在一个骨灰盒上》，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写的，诗云：

两旁雕满了呆板的荷花，  
过往的一切都全部装下，  
正中嵌着你昔年的小照，  
这就是你静寂的永远的家。  
可是我忘不了我们共同的语言  
那是一只高亢的亲切的歌——  
再见吧，妈妈……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最后两句，是回顾当年他们最爱唱的苏联歌曲之一《共青团员之歌》——在“毛泽东时代”，文艺是完全从属于政治的，当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时候，人们大量接受的就只能是苏联文艺：读苏联小说，唱苏联歌曲，看苏联电影……一旦毛泽东宣布苏联是“苏修”了，人们久已习惯的对苏联文艺的爱好就一下子变成了可能被当成罪名的危险。于是，蔡天一在写交代时就煞费苦心地将后两句改成了——

用斗争去迎接生活，

生活就是一匹驯服的骏马！

以后研究“文字狱”的人们，可能得花费许多心思来破解这首诗到底“反动”在何处。其实蔡天一的改动是无济于事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已经成为“毛泽东时代”政治生态的常态。对于那些身为专政工具的审查者来说，改后的那句“用斗争去迎接生活”仍然可能推断出问题——你两个反动家庭的狗崽子（其中一个还是“天主教徒”），想跟谁斗争？想迎接什么生活？

可惜我一点也记不起蔡天一与我谈诗的事了。对于他来说，写诗就是他最重要的生活与精神寄托，而我那时正专注于瞬息万变的文革局势——“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刚揪出了又一个“反党集团”，周恩来在首都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宣布揪出“杨、余、傅”的讲话时，一口气领呼了一长串“打倒”口号：“打倒刘、邓、陶！打倒彭德怀、贺龙！打倒彭、罗、陆、杨！打倒二月逆流干将谭震林！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打倒王、关、戚！打倒一切阴谋家、两面派！”全国掀起“打倒黑干将，揪出变色龙，横扫小爬虫”的新一轮揪人整人新高潮。在这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势下，我完全没有把一首小诗的事放在心上。

留在我记忆中的，不是蔡天一谈诗，而是蔡天一唱歌，用他那浑厚低沉的次中音唱外国歌曲，特别是那首苏联歌曲《黑龙江的波浪》，在《外国名歌200首》的众多歌曲中，这一首就是听他唱过后我才倍加喜欢的。可是这也是当时不敢放声高唱的名歌之一，特别是在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谁敢唱苏联人对黑龙江表示“我们坚决保卫您的安康”？

还有一个难忘的印象，是蔡天一在1976年出差到重庆时来我家（当时他已经在成都轴承厂当了工人），眉飞色舞地讲起成都春熙路贴出的大字报《号票歌》，那篇不知谁写出的嘲讽文革“大好形势”的民歌体大字报，引来大批民众围观，争相传诵，“烟要票，酒要票，肉要票，糖要票。样样东西都要票，一人发了一百号。……一号票买豆豉，二号票买粉条，三号票买点心，四号票买花椒……烟票锅票灯泡票，花生糯米月饼票。缝纫机要工业券，自行车儿票拈票……美帝反动苏联修，只有我们最最好……”（我当然不可能记住他背诵的这些文字，这几句是从后来《龙门阵》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里抄的，但内容完全就是他当年背诵的那些。）他几乎把整篇内容全背给我听了，还告诉我，有人在旁边加批了一句：“邓兴国你不要跳，你晓得下个月烟票是几号？”邓兴国就是当年我们那个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一号勤务员”，1976年时他正纠集了一些人在搞“反击右倾翻案风”，但那时已经没有什么人赞同他们那样闹了，大乱十年，民心思治，老百姓谁还愿意那样穷折腾？再加上文革以来政坛上各色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充分表演，已经让老百姓不会再相信政治家们的表面文章了。一个连基本生活用品都要凭票限量供应的国家，还天天鼓吹“到处莺歌燕舞”、“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谁信？

以后我们各忙各的，联系时有时无，因此对他那段写诗的经历及“反动诗”案并不清楚。直到这次为写此文我才了解到：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蔡天一受到成都一诗友的牵连，起因是成都几个文人趁动乱之机相约到峨眉山游玩，因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革大动乱极为不满，下山时他们把沿途的毛主席语录牌逐一推倒，回成都后此事被检举揭发，进而打成“反革命集团”，蔡天一文革前就与其中的人有过诗文交流，这时又有人在被迫交代时提到了蔡天一文革前写的几首“反动诗”，成都公安局军管会发函到筑路处，因此蔡天一就被要求写下了那些交代。

随后，蔡天一被筑路处开除（而不是解雇）回家。这时他的父母都已经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父亲蔡启渊（1909～1968），黄埔军校八期毕业，曾任黄埔军校教育处工兵科上校筑城教官。1968年5月25日在山西省平陆县张村小学被批斗致死。1982年平反。

母亲邱淑珮（1917～1967），成都树德中学毕业，曾任四川省邮电管理局长途电信科主办科员。文革中因受到批斗威胁，于1967年7月8日在家中自杀身亡。

蔡天一在家中是老大，下面还有弟弟妹妹，他当时面临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1971年，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四川省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71〕人保刑字第422号刑事判决书缺席判决：蔡天一“罪行较轻，不予刑事处分。”但并未通知本人，实则实施内控，出门要向街道上的监管人员请假，白天被盯梢，夜晚常会被派出所来“查夜”骚扰。张征祥有一次到蔡天一家去玩，正碰上分管那一地段的户籍警察陈某在盘问、“敲打”蔡天一（有时蔡天一正看书时被这位陈户籍撞见，书还会被收缴，收去的书包括艾青的《诗论》、李劫人的《风土什志》和《聊斋志异》、《斯巴达克思》等）。看到张征祥进屋，那警察用审查犯人那样的诡异眼光把这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上下左右打量一番后，板着脸问他是什么人，住哪里，来干什么，并且说：“这个地方不能来！”张征祥没好气地拿文革前一首粉饰现实的歌曲的名字回敬他：“啥子不能来？祖国大地任我走！”

直到文革结束三年之后的1979年，经蔡天一再三申诉，他那所谓“反动诗”案才由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79〕刑申字第1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这就是“毛泽东时代”一个青年因几首抒写个人感情的小诗而遭到的厄运。

蔡天一被开除的事当时我不知道，我正在重庆为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而焦头烂额。后来总算在一家钢厂当上了工人，生活稍稍安定之后，1973至1974年间，我在“高温、有毒、重体力”的有色金属冶炼工作之余，周末回家的闲暇里，断断续续写了一首回顾自己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的长诗《青春》，其中有这样几句：

像那羽毛未丰的鹰雏，  
还等不到冲进生活的风雨  
便向头上的蓝天  
发出心底急迫的、嘹亮的  
叫声，  
你开始  
把最初的诗句  
悄悄写进了笔记本。

诗……

我们那时候真正懂得诗吗？  
可那又有什么要紧！  
难道我们不是在  
用诗来描述理想  
用诗来看待生活  
用诗来设想人生？  
青年时代——  
诗的时代呀！

……

那些从不会编进《选集》或《全集》的诗呀，  
在它们杂乱的韵脚中，  
在它们幼稚的比喻里，  
在它们的惊叹号和省略号后面  
有我们多么真挚的热情！

然而，在我们的青年时代，我们并不能自由抒写自己的感情，即使我当时所写的这类自认为是“思想健康”、“奋发向上”的诗，也只能私下里在几个朋友间传看、交流，还得提防着被别有用心的人拿去断章取义分析上纲遭遇“文字狱”……

如今有人还在怀念“毛泽东时代”，有人还在呼唤要“再来一次文革”，他们或是出于无知，或是出于健忘，都不了解或是故意无视那个时代对人的自由心灵的桎梏和戕害。蔡天一的“反动诗”案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在那个时代，一个正值诗情年华的青年不能自由写诗抒情，特别是不能自由抒写与当权者认定的所谓“主旋律”不合的个人感情，否则，轻则会被视为“思想不健康”（在亲朋好友间也会遭到善意的警告或如我对他的批评那样的冷遇），重则会被认定“思想反动”甚至成为专政机关清查的“罪案”。

太史公曰：“《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郭沫若为成都杜甫草堂题联曰：“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在“毛泽东时代”，包括郭沫若这样的“大文豪”在内，谁能为“世上疮痍”、“民间疾苦”而发愤作诗？

那是一个非诗的时代。

那是一个非人的时代。

值得庆幸的是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尽管还有人在为它招魂，但我相信它是回不来了。

2012年11月18日改定于重庆风江阁

~~~~~

【一家之言】

听鲍彤谈林彪

• 高 瑜 •

导言：听鲍彤谈林彪是十分难得的机会，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做了新南巡和1月5日中央党校研讨班上两个重要讲话，提出他的历史观，引发朝野巨大争议。在这个大背景下，鲍彤也谈了他的历史观。

1月5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

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正式提出了他自己的历史观。与他“新南巡讲话”中总结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强烈批评“历史虚无主义”紧密呼应。

2010年7月21日，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过“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因此，如何研究中共历史，什么才是搞“历史虚无主义”，这不仅关系着习近平主政之后新闻出版，历史研究的自由度，而且关系着当前朝野，关系着社会新思潮各派的巨大分歧和争议。

◇ 鲍彤发表他的历史观

春节前，张清林为身兼美国有机化学博士和中共党史研究者双重身份，年轻的司马清扬先生组织了一场与国内文革史专家、“913事件”研究者、亲历者的学术座谈，特别邀请了鲍彤先生参加。鲍彤聆听后也发言，发表了一连串对“文革”、对“改革开放”的看法，将座谈会带入高潮，鲍彤言谈隽永，令人耳目一新，赢得热烈的掌声和赞许。

鲍彤说：“历史新的角色可以用望远镜观察历史，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当然每个人只能看到一部分。研究者呢，刚才小夏（司马清扬本名夏继波）提到陈寅恪教授，陈寅恪教授是用显微镜来研究，看得很细，小夏继承的就是这种科学的方法。对待每一件事，有没有这件事？每件事站得住站不住？和其他事情有没有矛盾？怎么来判断这些问题？我听了以后很受感动，这是一种好的研究精神。刚才刘（家驹）先生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知道有多少个问题，恐怕不是20个，也不是40个，现在看起来是一笔糊涂账。将来弄清楚了，是多少，就是多少，”

鲍彤认为：“现在已经‘说清楚的问题’，也都是糊涂的问题。现在只说清楚了一个问题‘毛泽东是伟大的’。‘毛泽东是伟大的’这个问题，我看被毛泽东自己说清楚了：毛泽东是渺小的。毛泽东所处理的一切问题，都证明他是渺小的，小人一个。林彪比他伟大，刘少奇比他伟大，说不定闹了半天江青也比他伟大。我是冒说的，因为不清楚的事情太多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我对刘少奇很有敬意，但是我知道刘少奇所做的错误那也是罄竹难书。林彪元帅肯定也是犯了许多错误的，但是在毛泽东控诉林彪这一点上，肯定毛泽东是错的，林彪没有错。如果毛泽东要制造林彪这样一个冤案，那就证明毛泽东一定是个小人。是伟大的人物，为什么要制造一个错案呢？”

◇ “五七一工程”的价值

鲍彤告诉大家：他知道‘五七一工程’是后来的事情。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第二天，他就是以‘走资派’身份，与外界完全隔绝。“913事件”没有让他听传达，他不知道。他听到的第一个正式传达是粉碎“四人帮”的传达，已经1977年了。在这中间对他是空白。

鲍彤讲了文革中的一件事：“在”913“很久以后，我这个（拍右胸）口袋里放着《毛主席语录》，这个（拍左胸）口袋里放着《林副主席语录》。有一次我拿出来这两本语录，要放在桌子上，有一个人跑过来，也是个老红军，原来新四军八师的副政委，他说：你现在手里怎么还有这本！他拿起林彪语录，啪往地上一甩。我心里想他告诉我什么信息？大概是林彪出了问题。（众笑。）

座谈中，小夏认为“五七一工程”到底是谁写的，不清楚。刘家驹和王鲁光（王飞长子）都证明，经王飞辨认，确实是于新野的笔迹。小夏认为，不管是谁写的，其中有些思想是从林

彪或者林彪周围人那里得到的。

鲍彤说：“我加一句话，‘五七一工程’恐怕是许多中国人的感觉，对毛泽东当时采取的许多政策的反感。‘五七一工程’反映了一些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那么也就证明‘五七一工程’有它的历史价值。”

◇ 林彪是“第一个邓小平”

鲍彤对林彪做了这样的结论：“林彪最后结论是叛党、叛国，现在党史上也是这么写的。如果林彪是叛党、叛国，我以为是很光荣的叛党叛国，因为意味着他是叛毛，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座谈中，学者们一致认为林彪与毛泽东在九大报告就发生了分歧，由陈伯达最初起草的九大报告，提出“主要发展生产力”，引发毛泽东的不满，遭到“四人帮”的攻击和嘲弄。

鲍彤说：“在九大报告起草中，如果林彪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该结束，不管他采取什么语言，很可能他采取‘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此应该转到生产力上来了’，因此有人就批判他‘唯生产力论’。那就证明后来改革开放第一号人物是林彪。抓生产力啦，‘发展是硬道理’呀，发展什么呀？我对邓小平这个话，我也有保留。什么叫‘发展是硬道理’？我请问，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那发展别的是不是也是硬道理？（张清林：发展贪污腐败。众笑。）那也是硬道理，那发展镇压是不是也是硬道理呀？如果‘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如果在某个历史时期，说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那第一个提出的应该是林彪，是九大。”

“从九大第一个报告被毛泽东否定，就意味着毛泽东本身是从失败走向失败。林彪到了这个时候本来想变成一个转折点，没有转成，林彪是第一个邓小平。邓小平后来好像是转成功，有人说他是‘总设计师’，这个人很不好，要批评。”（鲍彤摇着手，笑了。）（高瑜：这是鲍先生的杰作，“总设计师”是他的版权。）

鲍彤：“这个人讲错了，中国改革开放没有设计师，邓小平不是设计师，耀邦不是设计师，紫阳不是设计师，没有一个人是设计师。如果说有设计师，那是历史唯心主义，当然唯心主义也不一定错。但是即使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也是错的。总而言之是这么个意思，如果当时林彪有一个主张，不管他当时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在一定时期，采取一定的语境说话，都是要受限制的。”

◇ 林彪起了承上启后的作用

鲍彤说：“如果林彪在九大提出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应该转到经济建设，应该结束文化大革命，那林彪继承的是八大路线，林彪开启的是后来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是承上启后这样一个作用。”

“即使说林彪是叛国，我想要离开也是可以的，要离开的多了，孙中山就是离开的，美国也去过，日本也去过，英国也去过。（张清林：还有马克思、列宁。）马克思自己离开德国。为什么？他认为德国不自由，到英国去比较自由，那么他离开德国好像也没有说他是德奸。到是有人说列宁是俄奸。林彪的问题，如果他反对毛主席，如果他反对的是对的，有什么错？如果他反对以后不得已被迫出走，也是应该的。如果他根本没想出去，根本没有想到要跑到苏联去，反过来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要陷害他。反过来又说明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人要陷害他？”

“刚才姚监复说邓小平说驾驶员是好人，我就盯住，邓小平怎么知道？邓小平他那个时候又不在北京，他自己也在软禁之中，他怎么知道？由此可见，两者必居其一。第一，有非常权威的人告诉他的。第二，他查了档案，他知道这件事。如果有档案可查，邓小平能够看到，将来总要见天日。如果当时权威在场，权威也不是一个人，将来总是要水落石出。”

◇ 怀疑、挖掘历史功在千秋

鲍彤说：“现在的问题给了我们一种希望，就是大家看穿了这个里面有猫腻，这是个骗局，这是个骗人的东西，要深究，是个好事情。对现在历史的怀疑，是现在的人在维护它，是过去的人编造出来的。为什么过去的人要编造？为什么现在的人要维护？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挖掘？要抢救这些资料？我想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启发。”

“人，既然面对着一些疑团，总是要想办法要弄清楚的。有些细节也可能弄不清楚，很可能弄不清楚。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的事情现在闹清楚没有？焚的第一个人是谁？第二个人是谁？有没有人打抱不平？有没有人反抗？有没有人说公道话？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了，这件事铁定了。我们也知道第二件事情，有一个人姓毛，叫毛泽东，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好！我们也都知道了。除此以外还知道别的吗？细节也许我们将来越弄越清楚，也许弄不清楚，大的轮廓，大的是非，已经清楚了，叫大白于天下，不是小白于天下。细节弄清楚了更扎实，更是有说服力。”

“所以无论大的问题的研究，小的问题的研究，对我们这些糊涂人，对未来将会长大的人，知道有一段时间是不准讲真理的，这段时间真相是被掩盖的，真话是被歪曲的，是需要冒着风险，冒着压力来研究的，来探讨的。如果有这个认识，对今后的后人，今天也许还没有生出来，也可能今天已经生出来了，也许今天他是30岁，也许30年以后他才30岁，这不重要。但是我想，对我们太重要。我们知道我们的历史并不是像权威所说的那样，黑是黑，白是白，黑的倒反是白的，白的反倒是黑的。”

“前人做了很多的事情，刚才讲十个元帅，我不相信十个元帅都是一样的意见，很可能十个元帅十个意见。我也不相信是十个元帅当中有哪一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是正确的，有哪一位在所有问题上都是错误的。但是我相信在中国这样一种特殊的，这样一种残酷的内外斗争中，人都变了形。变了形之后，在各种场合之下，说出来的话，都很难反映他本人的真实的状况。我们可以理解他，我们可以说明他，我们需要了解他，但是我们要分析他。其中有某些东西还是不一样的，政治主张不一样，人品人格不一样，在某些问题上都有保存自己的一种可能，某些问题提出，对后人启发，那是很宝贵的。”

□ 《前哨》杂志2013年4月号

~~~~~

#### 【不堪回首】

#### 元宝山牧场的“挖肃”灾难

• 原志久 • 刘凤歧 •

在文化大革命中，内蒙古昭盟（现为赤峰市）元宝山牧场是个重灾区，四十八天的“挖肃”斗争，90%的人受到伤害（领导干部100%，原场职工90%，原场家属50%）在全场总人口400多人里，致伤、致残的就有40多人，自杀与因伤致死的6人。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无辜的，“挖肃”斗争给大人孩子身心造成的重创久久不能平复。

1966年冬，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展开，大草原上的元宝山牧场虽然地处偏僻，但也紧跟形势，职工家属学生纷纷成立“革命群众组织”，举起“造反有理”“破四旧”的大旗，打破了牧场的平静。在夺权斗争中形成两派，分歧的焦点是：牧场主要领导人以前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当时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牧场的工人尚能坚守工作岗位，农牧业生产没受大影响。

在成立牧场革命委员会时，对结合领导干部问题，两派产生分歧，各不相让，最后，原来的场领导无一被结合，场的革委会正副主任全由上级派，他们对牧场的情况了解不深，群众组织代表进场革委会的（即委员）也是老好人、中间人。

“挖肃”斗争，即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简称，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内蒙古版，由于牧场新班子的主任经常外出，场革委会的工作无形中由强势的副主任孙天祥主持，他是“四十八天”悲剧的导演，牧场的人说到四十八天都会提到他。

场革委会开会，全由孙副主任一锤定音（因为没有不同意见）。久之，造成孙的独揽大权，给他胡作非为创造了条件。此时从旗里分配来一批新毕业的初、高中学生，当时叫“知识青年”，孙副主任通过培训将这批青年中的一部分打造成一支“攻无不克的劲旅”、“挖肃”斗争中的打人凶手。

孙天祥以前是旗里的机动干部，一派群众组织的造反派的头头，他这一派是胜利者，因此被安排到元宝山牧场当二把手，分工专抓“运动”。他编造假案，动用酷刑逼人承认。他利用无社会经验的小青年充当打手。对牧场的职工、家属、学生、老干部、老领导残酷迫害。在逼供中即使将人致伤、致残、致死，孙天祥以“群众运动”为借口而无所顾忌。对本旗外的人，不管职务高低，对革命贡献大小，他毫不手软的迫害，但对旗境内的人他一边打一边拉，个别人竟成了他的心腹干将，也成了戕害人的帮凶。

此时的元宝山牧场暗无天日，受害者在“审讯室”里备受折磨，施刑者声似狼嚎的威逼（“你说不说！”），受害者惨叫呻吟，此情景使人怀疑：这还是社会主义的国营牧场吗？简直就是日本宪兵队。

陈辉民是牧场卫生所的医生，曾经在邻近的红山子公社医院工作过。1968年冬，孙天祥得知邻近的红山子公社医院挖出了“国民党”（都是假的），他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不能落在人家后边，要在元宝山牧场挖出“反动组织”，名扬天下。经过策划，将陈辉民作为突破口，先给陈安上罪名再逼他承认。就在他衣服后背的白布上贴上“国民党员”四个字，在审讯之前例行自报“罪名”时，陈没有自报出“我是国民党员”的罪名，被行刑者狠揍一顿。

开始，陈大呼冤枉，说：“我有错误，可我不是那玩艺啊！”折腾了好一阵，陈承认在距离本场较远的牧区“达里诺尔公社”医院入的国民党，审讯人员说：“你都干了哪些坏事？”陈说：“我不给贫下中牧治病。”又说：“我看不起院长。”审讯者说：“还有！”陈接着说：“我故意骑死过一匹好马。”

此时，督阵的孙天祥插话说：“他还有个发展任务呢，叫他说说他都发展了谁？”接着陈说了四五个蒙族人名。

这时候已经快到半夜了，斗争会将要结束，审讯者中有人说：“他交代的几个蒙族名字，就像汉人的张三李四一样普遍……”



陈辉民屈打成招，但他并未攀咬元宝山牧场的人。但以后就由不得他了，孙天祥让他咬谁，他不咬不行。审讯人员对陈说：“红山医院的康国玺大夫是地下国民党反动组织的头头，他已经把你供出来了，你是赖不掉的。”

陈辉民说：“我二人确实在红山医院工作过，个人关系并不好，他不可能发展我，我真的不是！”

审讯人员说“你不老实！”打手说“欠揍！”话到手到，各种刑法轮番用到陈的身上，把陈辉民折腾得不像人样，青年们也累了，怕陈死了（因还没有完整的口供呢）就将陈押回临时牢房，严加看管。

牧场因工作时间的原由，历来冬天吃两顿饭，晚饭后无事。但那天例外，晚饭后又提出陈辉民“过堂”，陈身上白天的伤痛还没过去，再添新伤，实在挺不住就“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是红山医院的国民党。知青们露出胜利的笑容，让陈辉民写文字材料，他们急急忙忙地向孙副主任汇报“战果”。并表扬陈“回头是岸”，前途光明。孙副主任指示青年要乘胜追击……

青年们向陈辉民指出“你要彻底交代你们的组织机构、行动纲领、人员名单——元宝山牧场内还有谁是你发展的？”

陈辉民挺不住刑瞎编了名单和组织机构。但他想到这样害了别人。

他说“我根本就不是国民党员，不知道组织机构，人员名单和行动纲领。”

青年们一听大怒，说他是“翻案”。因为已经向孙天祥汇报过，并受到表扬，他翻供，成绩全都泡汤了。于是就对陈用了大刑：四个人把陈按倒，在腿肚子上压上杠子（这是19世纪的刑罚，不知他们从哪学来的）。

压完杠子又把炉子升旺，对陈烘烤，当时陈大汗淋漓。在压杠子时陈发出阵阵惨叫，让审讯室外面过路的人听到了，都觉得毛骨悚然。陈辉民想：我这样被折腾死了，以后谁给我申冤？我死后妻子儿女谁管？此时他求生的欲望占了上风，先保住命再说吧。他跟青年要了碗水喝，说“我彻底交代”。就这样他写了些编造的材料，过后又一想这样不对，就又否认。

青年们给他用了一种新的刑罚：把拖拉机上传动用的三角带箍住他的前额至后脑一圈，然后用小木棍上劲，箍得头像要崩裂似的，双睛外凸痛苦难当，陈辉民只得又一次承认是国民党，并且列出名单，审讯者暗示他“咬”谁，他就“咬”谁，他咬了不少人。在他的笔下反动组织就无中生有的出现了。

在当天的大会上，孙天祥手举假材料，声音提高八度，神采飞扬地说：“大家看，元宝山牧场不是一片净土，是藏污纳垢的地方，这就是证明，我们坚决肃清。我劝失足者赶快惊醒，党的政策……”孙天祥的讲话拉开了四十八天的序幕。

陈辉民供出的反动组织名单里有副场长卢汉林。这可乐坏了孙天祥，他可抓住了反动组织在牧场的大人物啦。此时，内蒙古挖“内人党”的斗争在步步深入扩大，区内报纸、广播也大力宣传。在这样的形势下孙大主任在牧场挖国民党的信心更足。

卢汉林同志此时已年过半百，身体虽不错也禁不住精神压力和身体摧残，青年们对他用刑

狠、辣，三角带勒在头上（脑箍）几度用力，老人昏厥几次。实在挺刑不过，在审讯人员的诱导下承认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青年们向孙天祥报捷时，孙要青年们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卢副场长的家人就遭了殃。

卢汉林同志的老伴是全场有名的忠厚善良勤劳的农村老太太，子女多，过日子勤俭，从没和邻居红过脸，身体瘦弱。此时，那些凶恶的打手将老太太抓去不到半个小时就打成了“胖官”，连吓带打，老人已无法活动，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终生未愈。

卢的长女卢风云，被抓时正在经期，被打得昏厥数次，经血不住地顺裤筒流下。身心受到的摧残至今仍未完全恢复。

卢的女婿赵贵是牧场的会计，身体单薄，知青们将他带进审讯室开打，衣服打开了花，背部、头部皮带伤累累，一个小时就昏过去三次，被青年用冰水激醒，浑身水淋淋地扔在地上。

此时场革委会主任（一把手）看见了，找人把赵贵抬到炕上，换了衣服，叫人饮了点水。见赵贵的头部肿得厉害，只能看到嘴和眼成三条小缝。主任找到孙副主任说“不能再这样用刑了，如打死了人怎么交代？”

孙天祥不以为然地说“对敌人就是要狠，你现在同情他们，如果他们翻了天，他们对你就不客气啦，我看咱们班子应当反右……”

此话把主任吓了回去，再不管挖肃的事，任由孙天祥去折腾。

赵贵连连受刑，身体已经垮了，在审讯人员诱导下把“入国民党”的事勉强说对了茬口。再找他，他对各种刑法确实惧怕，想：怎样能够把这里的情况让上级知道？躺在炕上忍着伤痛苦思冥想，最后找青年说：“我有重要罪行交代，给我一点时间”。青年们向孙天祥汇报，得到批准。赵贵说：“我要交代重大罪恶。”青年们大喜，三个人作笔录，恐怕漏掉赵贵所说的一句话，赵接着说：“我不是才入的国民党，我是在国民党退却时就被发展成国民党了，后来又入了特务组织，在文革前又给我配备了电台。近来牧场挖敌人风声紧，我偷偷地把电台砸碎烧掉……”（当时赵贵26岁，国民党退却时他才多大啊？）

青年们听后大喜，让赵贵回牢房休息，再好好想一想还有什么交代的。就去找孙天祥汇报，孙听后高兴极了，让青年赶快抄赵贵的家。

这些青年到赵家翻箱倒柜，顶棚上、地下找了个遍，结果只找到一片烧黑的铝质薄片，约有36开白纸大小，（实际是一个破印台的底座）他们双手捧着交给孙天祥，孙如获至宝，立刻收藏在柜里，写成材料速报旗公安局。

第二天孙副主任在群众大会上手举黑铝片，高声对大家说“你们看，这是敌特用‘袖珍电台’的残骸，元宝山牧场的阶级敌人隐藏的太深了，他想销毁罪证，结果也被革命小将挖了出来，这是真凭实据，再狡猾的敌人也逃不出人民的法网，我已经叫人上报公安局了。”

赵贵用自己的智慧将元宝山惨案致死人命的信息报给了旗公安局。

在此之前，已“靠边站”的牧场原书记常水站出来，向主持挖肃的孙天祥进言并写一纸条，内容是“……以前牧场工作的错误都是我的责任，但我们场职工、家属除一名新调来的我不了解之外，没有一个国民党，没有一个内人党，我敢保证”。

此话一出口，常水就招来猛烈的批判，六十来岁的他还被迫弯腰请罪，胳膊被拧伤。同时他也被怀疑是“内人党”，说他长得像蒙族，为何报汉族？其实常书记是冀东人，抗日干部。从口音与行为举止都能看出来，怎么“像蒙族”？

刘凤岐在受刑人群里算是挺刑最久的。元宝山牧场挖国民党的斗争步步深入，刘凤岐在农业组被叫到场部受审，一开始他还与知青辩论呢，说本场没有国民党，后来知青给他用刑，刘宁死不承认，知青们叫他低头弯腰，拧胳膊，用皮带抽他，他挺过去了。

此时，黄分场也把怀疑对象调到场部。让他们看一看“国民党”们怎样受刑，起杀鸡给猴看的恐吓作用。有一名职工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他曾参加过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一开始他对审讯人员说：“国民党叫我们追击到海南岛，消灭了，这里没有国民党。”

审讯者说：“你是从部队复员后入国民党的！有人揭发你。”让他观看行刑情况，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不吃眼前亏”改口说：“我再想想。”第二天他的背后就缝上了国民党的牌子。

另一名共青团员看到别人的受刑惨状，夜里不能睡觉，一闭眼就出现施刑者们打人那种凶神恶煞的样子。次日一大早就去“自首”说自己是国民党员。

孙天祥在“宽严大会”上“宽”了这两位，说：“你们看，还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觉悟，知错必改嘛，早日回头我们欢迎！有些人顽固不化，我看你能抗拒多久。”

在刘凤岐受刑的第四天，卢汉林老人挺刑不过又按照审讯者的提示写出“反动组织”的名单。其中就有刘凤岐，另外还有王天泉、孙良山、杨山、王发、籍文等人。刘凤岐因不承认继续受刑，有的人头脑灵活，抓进审讯室一打就招。孙良山受刑三天咬牙挺过，白天知青给他缝上牌子，夜晚他自己将“国民党员”的字样撕掉，他连撕三次最后也没挺住，屈认了国民党的罪名。杨山被上“头箍”昏迷过去，青年用脚踢他腰（让他站起）踢坏了腰、肾，也被迫承认是“国民党员”。籍文搞“曲线自救”仅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的“狗腿子”不承认是“正式的国民党”。牧工戴子斌难抵酷刑，夜间溜出宿舍，自缢身亡。元宝山牧场的“挖肃”踩着群众的鲜血步步深入，以残害人命为代价向前发展。

刘凤岐受刑已经七天七夜，他以《红灯记》中李玉和为榜样坚持挺刑。此时元场挖肃已入白热化，刘宁死不招，青年们也不示弱，变着花样用刑，除了日常的喷气式以外又增加了“白鹤亮翅”“金鸡独立”“苏秦背剑”以及脸朝炉火等等刑法。由于刑伤，胳膊肿得穿不上衣服只好披着，两腿肿得脱不下裤子，昼夜穿着。疼痛使他有以头撞墙，把牙咬得咯咯响。

他挺刑到第10天，知青们感到对他“强攻”不能奏效，他们把目光注视到牧工卜玉明的身上，卜是个老实人，已被迫承认了自己是国民党。青年们导演了一出戏剧：让卜当场“检举”刘凤岐，卜怕挨打就同意了，经青年们导演了一下午一晚上，到了半夜才学会。但是到会场见到刘凤岐时，卜玉明干张嘴，吭叽了半天也没说出检举的话，最后说“在羊圈你跟我说来……”刘凤岐问“说啥来？”卜说“就是那个。”刘又问“哪个啊？”此时青年过来拍拍卜的肩说“好啦，你立功啦，回去吧”。于是收场。

刘凤岐受审到第11天。刘明白了：他们执意要整自己，不管真假，他们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如果被他们整死，谁来申冤？同时他也看到牧场的老职工几乎全被“专政”。经反复思考他对青年说：我承认，但已写不了字，你们写吧，我签字就是。

再说卜玉明与刘俊发二人被释放，孙天祥以“送回”羊组为名，实则是派青年监视他俩。到羊组后那位青年再次套问他俩，他俩说了实话：“我们都是老工人，哪能入什么国民党？我们是怕挨打才暂时承认的。”

这番话被青年汇报给孙天祥，孙立即吩咐：将卜、刘二人抓回，晚间开大会批斗。会上孙宣布：卜、刘两人是破坏挖肃斗争的反动分子，要把他俩打倒、批臭！

一部分“跟风”的家属一哄而上，骑到刘俊发的身上连压带打，刘俊发口吐鲜血，连血带汗流到地上。卜玉明原来怕挨打，现在被打得嗷嗷叫唤。他二人又被关押起来。

孙天祥为扩大战果，向各分场也派了得力干将，天天有捷报报到他面前。郭宝臣的胳膊被拧断，胡景山的肩关节脱位，家属杨怀荣胳膊被青年拧成两截，黄分场大师傅刘选的老伴被收审，不甘受辱服毒自杀。孙天祥得知也有些顾忌，给被“专”的“一小撮”开会，大讲“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运动后期……如何如何”，但他对被审人员用刑的力度不减反而加强，他此时的“成就感”正浓、升官梦作得正香，不顾人民死活，不管政策，一味地强调对敌人要狠，把耕地用的犁铧子烧红，叫受刑人背上——不怕他不招。

打手们用刑的花样翻新，王发的妻子怀孕，他们不打她就薅她头发，顶部的头发几乎薅光。籍文也被薅，头顶也几乎秃了。王发的岳父留长胡须，青年们先是一根一根的薅，后来一撮一撮的薅，疼的老人直哆嗦。

王发被打得不能走路了，躺在炕上。知青劝他，叫他咬刘凤岐，说刘曾发展他入国民党，王发没咬，因此他们将卧床的王发又暴打一顿。

小学生和家属也是挖肃的突破口，卢汉林、闫学洙、郭义、王发、罗树迁、李宗广、王峻山……都是“反革命家庭”。连10岁的孩子也不放过，身后背着白布牌子劳动。革委会监视这些“反动家庭”，夜间站岗、趴在门缝里偷听。不时地抄家，没收人家的钟表、银元……整个牧场人人自危。

赵贵的“台湾特务案”报到克旗，惊动了旗“公检法军管”，及时组织调查组开进牧场。

此前，杜春景等几位赶大车的工人赶车去赤峰。出发前对场内的恐怖局面曾发表不满言论（被知青们听到）自知回场后也将被“专政”，在途中商量：到赤峰向业务主管部门（昭盟食品公司）反映场内的情况。那时牧场的王久辉在赤峰帮公司修理汽车，王久辉对牧场的挖肃早就有不满，他们会合后就向公司领导李德永反映牧场的恐怖情况。

李德永率领王久辉与几位赶车工人到昭盟革委会，那里接访的马俊祥（军人）听汇报后深感事态严重，立即给下乡的盟革委会主任（周明，当时在巴林右旗）作了电话汇报。周听后回电话：一、揪出在清队工作中肆意践踏党的政策的幕后主使人。二、给致伤、致残的人员安排治疗。三、抓革命、促生产。四、把暗藏的阶级敌人挖出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

此四项指示令克什克腾旗革委会执行，而克旗也接到了派赴牧场调查组的报告。即由旗革委会主任（军人，刘国仁）赴牧场，先找牧场原来的书记常水了解，综合三方面的情况，确知元场前段“挖肃”中的问题严重。当晚即召开大会。

在会上刘主任代表盟革委会、旗革委会向受害人致歉（行军礼）此时，在场的群众都哭了。

刘又宣布盟、旗两级革委会的决定：

- 一、撤销孙天祥一切职务，交给群众审查、批斗。
- 二、安排受伤、致残人员就医，轻伤在场治疗，重的可到外地诊治。
- 三、抓革命促生产，把牧场的生产搞好。
- 四、将李堂（制刑具者）以及陈辉民带往克旗。

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把孙天祥揪到台前时，群众拍手称快，纷纷发言控诉孙的罪行，（知青们也揭露孙授计害人的阴谋手段）此时的孙天祥低头弯腰，向群众请罪。

此人在“挖肃”斗争后期被上级革委会决定“撤销一切职务，交群众审查、批斗”，最后刎颈自杀（当时被抢救送医院，以后死在医院）

元宝山牧场的惨案从开始到结束，整整四十八天。

□ 《炎黄春秋》2013年第1期

~~~~~

【文革一页】

曾经知名的“洪广思”

• 韩三洲 •

1970年9月，庐山会议召开后，鉴于陈伯达用马列语录包装他的“天才论”，毛泽东号召全党学马列、读原著，以识别陈伯达一类的“政治骗子”。同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各地的“写作小组”如梁效、石一歌、洪广思、唐晓文等也就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应运而生，而“四人帮”也通过自己掌控的“写作班子”炮制出大块理论文章以操纵舆论。所以，当年民间流传一句顺口溜——“小报抄大报，大报听梁效”。

这些极具权威的写作班子，名字听起来很是响亮，细细查考，大都是取其谐音而来。如权威性最高的“梁效”，就是江青控制的清华、北大“两校写作班子”的谐音，由迟群、谢静宜主持，后来这个写作班子的成员之一、北大教授周一良还写过一本沉痛反思的名作《毕竟是书生》。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为“罗思鼎”，取“螺丝钉”的谐音，由徐景贤、朱永嘉主持；早期上海还有一个“石一歌”，即由十一人组成的写作班子，余秋雨曾是其中一员。“唐晓文”是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班子的谐音，意为“党校文”，由康生控制；文化部的写作班子叫“初澜”和“江天”，是于会泳亲自组建的。还有一个“洪广思”，以前只知道是北京市委的理论写作班子，但这谐音是如何来的，一直想不清楚，也曾请教过研究“文革”史的专家，没有结论。

读过曾任北京市政协主席的刘导生的回忆录《从容忆往》后，笔者这才猛然发现“洪广思”此名的来历。书中说，“文革”期间流毒甚广的“洪广思”写作班子，在粉碎“四人帮”后，到他来北京市委之间的两年多时间，居然没有人去清查。而这个名字，其实来自北京西山红光寺，因为当年市革委会理论班子就住在这里。但是，当年也是北京市委宣传组写作班子成员之一的史松，在其新近自费出版的个人回忆录《浅浅的脚印》一书中，则说这个写作班子是在香山的洪光寺，因其在西山，枫叶灿灿，所以有时还用“燕枫”这个名字发表文章。书中披露，当今

党史界、文史界的很多名人，也都曾在这个宣传组里面。1956年12月，岭南画派擅长画松的大家、“岭南七杰”之一黎雄才先生曾来到香山，绘过一幅“西山红光寺”的画作，出现在2010年嘉德国际拍卖会上。可上网搜索，找不到“红光寺”，却有“洪光寺”。由此看来，刘导生与黎雄才的记忆都错了，写作组的地点，应为史松所讲的“洪光寺”，而非“红光寺”。明朝万历年间蒋一葵所著的《长安客话》，曾记西山名胜四刹：香山寺、洪光寺、碧云寺及卧佛寺。

史松回忆，相较前几个著名的写作班子，“洪广思”形成较晚。那是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姚文元问吴德，北京市人才很多，为什么不像别的省市那样组建理论写作班子？吴德这才开始行动，让北京市委宣传组着手组建，并明确指示：人民大学刚停办，人都分在北京市，其中的人才很多，可以从中物色。宣传组根据指示，决定从“文、史、哲、经、政、法”六个方面选调原人大的教师，如哲学系的罗国杰，中文系的阎焕东、经济系的陈耀庭以及《浅浅的脚印》的传主，都是那时候作为各方面人才选调进去的。写作组当年出的两本书，都是注释演绎最高指示的，一本批孔，名为《孔丘的反动一生》；另一本为《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等到号召“评法批儒”时，宣传组顺应形势，成立了“法家著作注释小组”，又从一些单位借调20多人参与此事，包括新华印刷厂、第一机床厂的青年工人。这样一来，借调人员已大大超出了在编人员，相继成立了四个小组。

那时“洪广思”的工作流程是：上头出题（有时也出思想），小组讨论定题；定题之后，再找相关材料研读，然后交流体会，拟定大纲，报小组同意，再分头起草；等有了初稿，再经多次讨论修改通过后，由一人统稿，最后报上面批准发表。当时曾传达过这样的指示：写作小组是市委的笔杆子，不是学术团体，不存在文责自负，让你们怎么写就怎么写，一切由市委负责。在轰轰烈烈的“评法批儒”运动中，对法家人物的介绍、对“法家路线”的吹捧，成为政治需要的时髦写作。当年上面曾布置下来一个任务，让写一篇借法家路线评吕后的文章，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篇间接吹捧江青的文章。小组领导大概不愿意如此彰明昭著，就将题目改成“汉初法家路线和文景之治”，写了好几遍，又讨论若干遍，最后才定稿。文章见报后，写作组曾设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轻车熟路地再来一篇评武则天的，题目是“唐初的法家路线与贞观之治”，结果看了很多书，费了很多时间，总是不太理想，迟迟难以“出炉”。正发愁之际，有人说毛主席提倡学习鲁迅，鲁迅对中国历史有很多议论，我们可以搜集起来研究，总题目叫“鲁迅的历史观”如何？把这个建议报上去，很快批准，写作组从北京图书馆拉回一车有关鲁迅以及研究周氏三兄弟的书……

宣传组下面的文学小组是最忙的，因为从来不缺少革命大批判的题目。评《红楼梦》的战斗檄文还没完，马上又投入到评《水浒》的战斗中去了。那时毛泽东的视力已经很差，可读书习惯没变，只好找北大中文系的女教师芦荻念书给他听。芦荻是搞中国古典文学的，自然想了解领袖对某部小说及其中人物的看法。所以在给毛泽东读《水浒传》时，就将毛对她提出问题的回答，整理成毛主席评水浒的材料，第一句话就是“《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还有，“《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等。芦荻将这份材料上报给主管北大的谢静宜，谢又转交给主管全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姚文元。姚看到后如获至宝，立即给毛写报告称：主席对《水浒》的评论十分重要，不仅对中国的无产阶级，而且对贫下中农；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世界人民；不仅对本世纪，而且对下世纪，都有伟大意义。姚文元还建议将这份材料印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学习。毛批示同意，姚文元手中有“令箭”，立即将此件印发全党，在全国掀起了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的运动。当然，姚的这些行为是有针对性的。

1975年是中国政坛起伏跌宕的一年，邓小平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后，开始全面整顿工作，并力求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作为。于是，以胡乔木、邓力群为主的国务院研究室便

受命开办《思想战线》，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明显与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红旗》杂志分庭抗礼，大唱反调。《思想战线》的创刊号准备发表三篇重要文章，第一篇定名为“论三项指示为纲”，由邓力群撰写；第二篇“论安定团结”，由“洪广思”撰写；第三篇“论民主集中制”，由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来写。获悉消息后，已对大批判感到厌倦的写作组上上下下无不欢欣鼓舞，除了主笔的政治小组，其他几个小组也都来参加意见，《论安定团结》成为“洪广思”群策群力的一篇文章。文章写成后，上交市委宣传组，审查了很多天，但到了主管宣传的市委领导那里，又给压下了。历经磨炼的官员们政治经验毕竟不凡，他们深知写这篇文章是在进行一场政治较量，文章一经发表就是一枚重磅炸弹，是否发、什么时候发，要看国内政治气候和战场形势而定。果然，他们的历史经验起了作用，文章还没发出，政治气候陡起变化，另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国务院研究室”全军覆没，《思想战线》也胎死腹中，邓力群的文章初稿被查获，受到重点批判。这时，市委宣传组负责此次写作的副组长急忙跑来，连连惊呼“好险！好险”，说幸亏市委领导有水平，压了好几天没有发，要不然，就不得了啊！这位副组长一再叮嘱写作组成员：我们和他们（指国务院研究室）毫无关系！是他们来约稿，我们早拒绝了，我们从来没有写过什么“安定团结”的文章，切记！切记！对外，一个字也不许提及此事。表面上，大家都极为严肃地唯唯称是，暗地里又觉得颇具喜剧色彩。

1976年初，写作小组从西山洪光寺搬到城里市委机关。此时，正值周恩来总理去世，“四五”运动爆发，很多人亲眼目睹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及其造成的天怒人怨。等到“四人帮”末日到来，“洪广思”的历史任务也就随之终结了。写作组曾经的成员们，也就一个个自寻门路、各奔东西了。

□ 《同舟共进》2012年第11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